



南京政治学院学术文库

SHI JIE GONG CHANG BIAN QIAN

“世界工厂”变迁

张明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政治学院学术文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5年度基金项目

“区位优势视角下的‘世界工厂’变迁” (05CJL021)

“世界工厂”变迁

张明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工厂”变迁/张明之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6

(南京政治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214-05802-7

I. 世... II. 张... III. 制造业—经济发展—研究—世界

IV. F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195 号

出 版 人 刘健屏

策划编辑 戴亦梁

装帧设计 许文菲

书 名 “世界工厂”变迁

著 者 张明之

责任编辑 丁 萍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436×1005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页 1

字 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02-7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总 序

伟大实践催生和推动着科学理论的繁荣发展。诞生于1977年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沐浴着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迈开了与科学理论创新发展同行的铿锵步伐。马克思主义教员群体在这里集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这里高举，政治工作生命线在这里延伸。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不懈追求。为鼓励教研人员热情投入理论研究，多出精品力作，多出名师大家，学院设立了“学术文库”出版基金，资助推出军事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系列的优秀成果，分别委托军事科学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一方面促进自身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为繁荣国家和军队的科学理论研究贡献微薄之力，使之成为展现学术繁荣的窗口、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扶掖学术新人的摇篮。创新难免瑕疵，碰撞产生火花。文库的出版也蕴含着成果作者的热切期盼，渴望各方专家不吝赐教。

南京政治学院学术委员会

目 录

导论 1

- 一 问题的提出 1
- 二 文献综述 3

第一章 区位优势：一种理论假说 31

- 第一节 区位、经济区位与经济增长等高线 31
- 第二节 地点竞争力与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 36
- 第三节 区位优势分析框架 44
- 第四节 基于区位优势视角的世界工厂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61

第二章 初级区位优势：以英国世界工厂为例 64

- 第一节 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世界工厂缘起的区位优势解析 64
- 第二节 英国世界工厂的成长与兴盛 72
- 第三节 初级区位优势停滞与丧失：英国世界工厂的衰落 95

第三章 中级区位优势：以美国世界制造中心为例 105

- 第一节 投资驱动、技术变革：中级区位优势的内核 105
- 第二节 投资技术伴生驱动：美国世界制造中心兴起的主动因 109
- 第三节 区位优势消解：美国世界工厂的衰落 137

第四章 从技术模仿—革新到持续创新：造就高级区位优势 151

第一节 技术模仿—革新范式主导的中阶区位优势：

日本世界工厂的例证 151

第二节 原发性创新缺失：新经济浪潮中日本制造业的低迷 178

第三节 持续创新推动下的区位优势：美国制造业的战略调整 185

第五章 世界工厂变迁历程：规律、现实条件与趋势 198

第一节 世界工厂的演变与特定的区位优势变迁 198

第二节 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世界工厂 215

第三节 世界工厂的发展趋势：内涵丰富性与形式多样性 251

第六章 中国“世界工厂”：区位优势的新解与理性定位 262

第一节 中国区位优势演变与重新解读 262

第二节 中国“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理性定位 291

第七章 中国“世界工厂”的升级：展望与战略 305

第一节 要素依赖型制造业、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中国“世界工厂”的升级 305

第二节 中国“世界工厂”升级的政策战略体系与制度保障 315

第三节 创新文化培育与自主创新 336

主要参考文献 358

后记 367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以更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正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市场正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参与国际分工、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成为许多工业制成品的主要生产大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从 1993 年到 2007 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从 4800 亿美元上升到 13000 亿美元,在全球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 2.4% 上升到 4.7%。自 1990 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增长了近 3 倍,比全球制造业的总体增速快 10 倍,中国已成为了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制造国。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

2001 年 5 月 18 日,日本通产省的《面对 21 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白皮书首次承认,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雁行结构”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迅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日本的《产经新闻》在 2001 年 7 月连续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加盟世贸组织,中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即使“在信息技术等最尖端的领域,中国也在摸索世界标准,将在国内外与日、美、欧开展争夺战,其前哨战已经开始”。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2001 年 8 月 2 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发表的麦肯锡日本公司董事

长大前研一的文章《亚洲的下一个危机：中国制造》指出，中国制造业将以越来越充沛的活力迅猛发展，而世界其他国家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中国大量闲置的低工资和极具可塑性的工人是这个国家一个非常大的竞争优势。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教授甚至在2002年6月17日的美国《商业周刊》上提出，“中国正在变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位置，很快就会相当于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地位。而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也必然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威胁。”^①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当然也有相反意见，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投资最安全的地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给低迷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产业周刊》2002年2月把中国制造作为封面故事，署名文章指出，“中国是最适宜制造商的地方”，“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的大国，为了击败它们的竞争对手，世界上对市场保持敏感的制造商正在把它们工厂迁移往中国。它们被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丰富而训练有素的工厂以及精致的制造流程所吸引。”^②

此后，有关中国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加工车间”的争论纷纷见诸于报章。例如，吕政认为，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工厂，将来能否成为世界工厂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世界工厂不应是中国的目标。^③陈锦华认为，中国目前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制造业强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自主核心技术来看，中国还远远比不上18世纪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更比不上19世纪以后的美国和日本。^④刘伟认为，中国只要能继续保持7%以上的经济年增长率，就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⑤金碚也认为，中国工业化过程若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工业规模扩张，就必然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⑥

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机会论”，无论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加工车间”，实际上都表明了中国经济和制造业正成为世人瞩

① Jeffrey E. Garten, “When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Business week*, June 1, 2002.

② Jone Mcclenahan, “Made in China”, *Industry week*, Feb, 2002, Vol. 251.

③ 参见吕政《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载《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8期。

④ 参见陈锦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尚待时日》，载《国际金融报》2002年7月30日。

⑤ 参见张然、刘伟《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势所必然》，载《市场报》2002年9月6日。

⑥ 参见金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载《中国证券报》2002年7月19日。

目的焦点。尽管正如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关志雄在 2002 年 6 月 25 日的《亚洲时报》撰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要成为与日本获的发达工业国家,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Made in China 实际上是 Made by China,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包含很多诸如‘日本制造’外国的零部件,这些进口的零部件当然并不构成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真正在中国创造的附加价值,仅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①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但是,中国经济正处于持续的高速增长期,2002 年又成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有报道指出,据商务部外资司 2004—2005 年度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500 强排行榜显示,中国外资企业销售额 500 强中制造业领域占八成,专家认为该状况依然与中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国家有关。^② 尽管存在着一些障碍,中国仍对外国制造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制造业领域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的成就更是令人鼓舞。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厂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我们必须冷静思索,世界工厂的标准和内涵是什么? 历史上有幸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历史上的世界工厂变迁的逻辑线索是什么? 与历代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的制造业能否达到以往世界工厂的成就? 世界工厂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是什么? 推动世界工厂演进和变迁的原因、规律和理论支撑或理论依据是什么? 中国应当如何真正实现“世界工厂”的梦想?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和深层次的梳理与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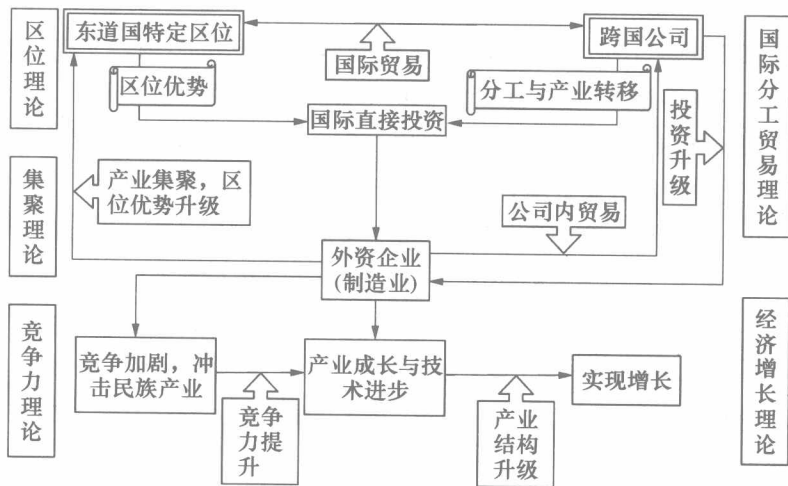
二 文献综述

从区位优势视角探究世界工厂变迁的历程和规律,思索中国“世界工厂”成长方略,将涉及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诸如区位理论、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集聚理论、竞争力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等(详见下图),需要从浩瀚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梳理出清晰的线索,建立区位竞

① CHKwan, “Why Japan Doesn’t Fear ‘Made in China’ Label”, *Asia Time*, June 25, 2000.

② 参见张玉珂《外企 500 强 8 成制造业,中国何时摆脱世界工厂地位》,载《北京现代商报》2005 年 12 月 4 日。

争优势的分析框架,实非易事,本文试图取得一些突破。



本书涉及的主要理论与线索

(一) 经济区位理论的演进发展: 本文切入分析的理论视角

早先的经济学大多忽视空间的研究。马歇尔(A. Marshall)曾讲过,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是时间因素——比起空间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时间是最基本的因素。艾萨德(Walter Isard, 1956)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由于时间因素无法解释诸多现实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对区位问题的研究不断增加,1905年,爱因斯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又于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揭示了空间和时间的辩证关系,并加深了人们对物质和运动的认识,使区位理论越来越成为解释人类活动中对地理空间选择的得力工具。正如蒂斯(Jacques-Francois Thisse)所言:“区位理论是区域科学的基础,是解决非空间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①

最初的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是用以解释农产品的来源问题,与其有关的两个互补性理论分别由李嘉图(David Ricardo, 1821)与杜能(J. H. von Thunen, 1826)提出。李嘉图建立了基于相对肥力的农业地理理论,但却忽略

^① Jacques-Francois Thisse, “Location Theory, Region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87, Vol. 27, No. 4.

了运输成本；而杜能则正好相反，他考虑到了运输成本，但却假定土地是匀质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及贸易增长，经济学家的视线开始转移到工业区位。韦伯(Alfred Weber, 1909)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理论。随后，区位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中区位集聚因素成为区位理论发展的重要线索。帕兰德(Tord Palander)认为产业活动的位置应该以生产的所有费用的总和最小为依据，他试图把不完全竞争的概念引入区位论研究中，以价格为变量研究区位空间的均衡，同时他在运费分析上，提出了远距离运费衰减的规律，这是对区位论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胡佛(Edgar M. Hoover, 1937, 1948)则分析了产品中转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并对制造业生产地域界线的划分进行了详细研究；洛什(A. Losch, 1940)提出了工业活动区位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最大利润地点的观点。总体上，古典区位论对企业生产和定价的地域空间效应进行了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区位的布局均衡，忽视了宏观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问题。

以艾萨德(1960)的《区位与空间经济》和贝克曼(Beckman, 1968)编辑的《区位理论》的发表为标志，以新古典区位论随之形成并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并扩展到区域科学和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新古典区位论主要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继续利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工具如价格、供求、竞争等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其主要代表拉伯(Labber et al)和蒂斯等学者利用拓扑网络构建区位模型，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另一条是在市场区位论、区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凯恩斯的宏观均衡分析方法对区域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艾萨德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前者称为新古典微观区位论，后者称为新古典宏观区位论。^①此外，弗农(R. Venon)还分别对贸易区位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区位进行了探讨，而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① 参见陈文福《西方现代区位理论述评》，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以克鲁格曼(P. Krugman)^①、藤田(Fujita)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new economic geography)利用迪克斯特(A. K. Dixit)与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并借助萨缪尔森的“冰山”原理以及后来的博弈论和计算机技术等分析工具,把区位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区位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力图以新理论对区位论的传统问题进行研究;二是以新理论为基础,以全新的、空间的观点分析国际贸易”^②,力图将区位理论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③ 克鲁格曼强调的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技术创新是形成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重要源泉。一国可能因为最初的偶然原因和历史积累形成且巩固了某些产业的优势,但一个没有创新的国家将会失去其的领先地位,而且这种速度将是十分迅速的。

(二)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区位竞争优势演变的逻辑思路

比较优势理论是解释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主导理论,从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到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再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其核心在于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差异,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即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

① 克鲁格曼于 1991 年发表了《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成为新经济地理学派区位论的奠基性文献。

② Paul Krugman,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2, Number 2, Spring, 1998, p. 68.

③ 实际上,国际贸易学家俄林(B. Ohlin, 1933)在其《地域间和国际间的贸易》一书中就曾指出:“区位论比国际贸易理论具有更广的研究范围,国际贸易理论不过是一般区位理论的一部分”。参见 B. Ohlin,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素上面具有比较优势,并生产了凝聚这些生产要素的产品的国家进行交换,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增进福利^①;而一旦一个国家是按照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形成产业结构,其产品在国际、国内生产上就具有竞争力,经济增长就较快。^②但这种理论难以解释经济特征相似国家间的贸易,难以解释现实国际贸易中为何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③,以及所谓“里昂惕夫”之谜(The Leontief Paradox)等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出现了比较利益陷阱(洪银兴,1997),即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王佃凯,2002)。

因而小岛清(Kiyoshi Kojima, 1977)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转移,根据从比较劣势行业开始投资的原则所进行的对外投资也可以扩大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发生在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现象,但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且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东亚的“雁形模式”开始解体,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① 参见 B. Ohlin,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参见 Peter G. Warr,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November, 1994, Vol. 8, No. 2。

③ 国际贸易的现实向人们展示了大量的国际贸易是在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的。例如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他们之间的贸易占全世界贸易的2/3以上。此外,当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

对竞争优势的重视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哈佛学派对企业战略、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的研究和 80 年代波特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分析。尤其是波特将其在企业竞争力领域的研究成果^①扩展到产业和国家的层面,进而形成了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企业可以将自己的竞争优势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低层次的竞争优势是一种“低成本竞争优势”,而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是一种“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因此,一个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投资和创新的環境对企业创造高层次竞争优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认为,资源禀赋对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发挥作用,但基于资源禀赋优势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常常是难以持久的;以规模优势、技术差距和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一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也是不太完美的。基于此,波特提出的“钻石体系”模型(diamonds framework),提出竞争优势来源于培养高级要素、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企业战略和激烈的国内竞争,此外政府行为和机会的把握对竞争优势会产生重大影响。

就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而言,瑟罗(Lester C. Thurow, 1996)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较好地解释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产业地理分布状况。而进入 21 世纪,自然资源、资金的可利用性已不再是竞争要素的主要来源,仅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是不会成为富裕国家的,知识和技能才是比较优势及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天赋。但同时,制造工艺技术的领先比之新产品研发技术的领先更为关键。^② 而林毅夫等人(2003)提出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经济系统内生的,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的变化。要素禀赋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其中资本存量变化对一国要素丰裕度的影响最大。如果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则其生产成本就较低,竞争能力就较强。尽管在经济分析中,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可以区分的两个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它们联系密切,往往是不可分割的:一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

① 参见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 1997 年版;《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参见 Lester C. Thurow,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ro Press, 1996, p. 72。

易于形成较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即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内在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二是一国的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缺乏国际竞争力,也无法实现其比较优势,反之非常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很难形成和保持国际竞争力,一些国家原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由于国际比较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失去国际竞争力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三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本质都是生产力的国际比较,所不同的仅仅是比较优势强调的是各国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强调的则是各国相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比较。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完全割裂、相互对立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相反,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市场的充分竞争,使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政府还能以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2001)基于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模式 and 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特别是禀赋结构、技术选择、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认为,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其他变量,如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等均内生于这两个变量。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大多并不依赖于高成本、高风险、密集资本投入的 R&D,而主要依赖于低成本、低风险、低资本投入的技术引进。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赶超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企业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从而造成了企业治理中信息传递的扭曲。中国之所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

在于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战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区段。^①

洪银兴是国内较早提出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的学者^②,他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基于资源禀赋的产品的比较优势的竞争劣势越来越明显,后发国家易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比较利益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二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而无法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③正如刘易斯所说的:“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的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微快一些。”^④而在产业升级基础上创造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的途径是形成特定产品

① 参见林毅夫《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对“比较优势战略”批评意见的几点回应》,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林毅夫《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林毅夫《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林毅夫《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载《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林毅夫、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② 参见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洪银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载《光明日报》2002年7月2日。

③ 参见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

④ 刘易斯:《增长引擎的减慢》,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11页。

和特定环节的比较优势,是非资源禀赋的、具有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这成为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即可以根据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来定位竞争优势,就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态势而言,所追求的并非一定是全方位的竞争优势或压倒性的竞争优势,也不一定是某产业领域的完整价值链所有环节的竞争优势,而可以是某些产业特定产品和特定环节的领先优势。

(三) 国际资本转移和国际直接投资:考察区位优势的重要视角

世界工厂的成长必然伴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伴随技术的输出),英国世界工厂的诞生并非完全归因于之前的研究所认同的技术革命或产业革命,荷兰金融资本和与金融资本相伴的技术的大量流入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世界工厂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巨额资本。因此,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研究世界工厂的演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构建,将东道国纳入其全球生产体系。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将某些制造环节大量转移至海外,为东道国制造业的成长带来了重大的契机。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有利于把握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对跨国直接投资进行了充分的研究。F. Sovthard (1953)提出区位理论,用以解释直接投资的走向问题。海默(Stephen Hymer, 1960)和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等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初步对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小岛清(1977)的比较优势理论较为成功地解释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直接投资现象。弗农(1966)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说明了企业经营的国际化过程。邓宁(John Dunning, 1980)吸取了内部化等理论的优点,发展了 OLI(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 and 内部化优势)理论,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为企业跨国经营投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Bruce Kogut(1985)提出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的价值链模型。

近年来,在上述理论的支撑下,国内外学术界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区位选择性,并由此导致投资和产业集聚效应,因此,研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中区